

語言學研究與批判

第二輯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編

高等教育出版社

目 录

十年来汉语语法学的成就 陆 仁 (187)

解放前汉语语法的研究

——《近六十年中国语言学》(初稿)的一章 (201)

上古汉语入声和阴声的分野及其收音 王 力 (233)

五四以来汉语词汇的一些变化 伍 民 (278)

试论赵树理作品的语言风格

..... 北大中文系 1956 级语言班 (291)

法兰西学派汉学家在汉语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 高名凯 (310)

后记 (349)

十年来汉语语法学的成就

陆 仁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成立后, 汉语语法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我国现代语法学, 从 1898 年《马氏文通》出版算起, 迄今已有六十一年了。建国十年来汉语语法学在各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远非解放前的五十一年所可比拟。现在, 我们从语法知识的普及和语法学研究的进步与提高这两个方面, 对十年来汉语语法学作一简要的回顾。

开国以来, 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 语法知识的普及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951 年 6 月 6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 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 它明确地指出: “正确地运用语言来表现思想, 在今天, 在共产党所领导的各项工作中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号召人人都来改正使用祖国语言的混乱现象。为了帮助大家改正语文中的缺点, 连载吕叔湘、朱德熙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各级党组织、政府机关、人民团体都很重视这一工作, 作了许多组织、宣传工作。广大的干部、职工、解放军官兵、中小学教师也从自己的工作中体会到迫切需要学习语法修辞的知识来提高语文修养。这一切汇成了一个群众性的学习语法修辞知识的高潮, 普及语法知识工作得到蓬勃地开展。

基于广大群众的迫切需要，十年来介绍语法知识的通俗读物出版了一百多种；^①《中国语文》《语文学习》《语文知识》等十几种期刊也时常登载语法方面的文章，散见在报章杂志的语法文章更是数以千计。语法书籍的发行数量非常大，《语法修辞讲话》单行本第一次印刷时，第三、四、五讲就印了二十至三十万册，^②《语法初步》自1952年至1956年四年内共发行一百六十余万册。这样大的发行量是解放以前难以想象的。

在这些为数极大的通俗出版物中，有不少是质量较好，为群众欢迎的。吕叔湘、朱德熙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是第一部面向群众、联系实际的比较通俗的著作。它是“为了帮助大家纠正语言文字中的缺点”而写的，讲求实用，目的明确。它引用的正面例句大部分来自当代典范的白话文著作，尤其是毛主席和鲁迅的作品；同时又从报纸、期刊、文件上摘取大量的错误例句，把两者加以对比说明。因此“着实介决了语言使用上的实际问题”（叶圣陶语），深受读者欢迎。曹伯韩的《语法初步》虽然是一本小册子，但介绍的语法知识还是比较全面的，文字写得浅显，只要有小学文化程度就可以看懂，它的普及面比《语法修辞讲话》更广。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语法讲话》在《中国语文》上连载，对于语法学界的影响很大。其他象吕叔湘的《语法学习》、张志公的《汉语语法常识》也都是比较好的著作。这些书的共同特点是力求吸取过去各家语法研究的长处，并用作者自己的研究成果加以补充，取材都来自当代的作品或报章杂志，文字力求浅显易懂。这些事实说明

① 北京大学图书馆根据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及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图书馆的藏书统计，解放后出版的语法著作（包括重印解放前的著作）约有二百零四种，其中：通俗著作一百零四种，大学教材二十五种，函授教材五种，语法理论著作三十六种，一般教材十一种，外国留学生汉语语法教材两种，文言语法二十三种。（以上数字不包括中学课本）

② 第三讲《虚字》二十万册，第四讲《结构》三十万册，第五讲《表达》二十三万册。

这些著者都在努力为广大群众服务。

語法知識普及工作的蓬勃开展，不仅为我国語法工作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同时也使过去被少数人搞得深奥神秘的語法学的面貌焕然一新。它使語法学同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要求，同祖国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建設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使語法研究工作获得了广闊的社会基础，因而使語法学界呈現出生气勃勃的景象。

学校語法教学是語法知識普及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解放以来同样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視，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解放以前語法課程只在少数几个大学里开过，課程內容一般都脱离实际需要。解放以后苏联語言学教学的先进經驗、各种語法教材、各門課程的教学大綱大量介紹到我国来，对我国語法課程的設置，教學內容的安插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十年来高等学校語法課程作为整个語言学課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发展得特別快。現在許多綜合性大学不仅讲授現代漢語語法、古代漢語語法，就是漢語語法史和語法理論等課也开始讲授，語法課程已初步形成一个系統。师范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普遍讲授“語言学引論”“現代漢語”“古代漢語”等課，都很重視語法的教学。各大学編写的語法教材公开发行的就有二十五种，院校之間交流的語法讲义更多。1958年全民大跃进中北京大学漢語教研室集体編写的《現代漢語》上册語法部分，把讲授系統的語法知識和糾正語法上各种錯誤結合起来，着重联系同学的实际需要，这是双反后的一个新的改革。

中小学語法教学的推行是学校語法教学工作的重大进展。解放前只有极少数的中学有时进行过一些語法教学，就是这个，也只是因入設事，不被重視，小学根本就无所谓語法教学。解放后有了一个根本的变革，現在高小学生就已經知道什么是“主語、謂語、動詞、形容詞”等等，这是解放前根本不能設想的事。中小学語法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能正确使用祖國的語言和提高他們的邏輯思

惟能力。这对我国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和祖国語言的健康发展都有重大的意义。中小学語法教学过去缺乏經驗，解放以来才摸索着前进。1956年曾經一度把中学語文課分成文学和汉语两科，加重了語言教学的分量，但由于中学生課程負担过重等原因，半年以后仍并为单一的語文課。这次变动为今后更好地进行中学語法(語言)教育提供了很多教学上的經驗。

中学語法教学在解放初多是采用《語法修辞講話》《汉语語法常識》《語法学习》《語法初步》等作教材或参考书的；各个地方各个学校都不一样，使教学上发生很多困难，各方面都迫切需要一个比較統一的語法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在編写汉语課本时採納了各方面的意見，从1954年上半年开始着手拟訂一个語法系統，经过几次修改，几次試教，并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見，在1956年正式发表《暫拟汉语教学語法系統》，根据这一系統編写了中学《汉语》課本的語法部分，又組織各地語法学者集体編写了《語法和語法教学》。新知識出版社也組織許多語法学者根据这一系統編写了《汉语知識丛书》中語法部分的三輯共二十三册。《暫拟汉语教学語法系統》和中学《汉语》課本語法部分的出版，是語法教学、語法知識普及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它是我国語法学者、語文教师空前大合作的产物。发表以后受到各方面的重視和支持，很多单位都拿它作为教本或参考材料，不仅成为中学共同采用的語法教学系統，而且也促进了全国各种語法教学系統的統一。在語法教学和語法知識的普及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解放后到我国来学习的外國留学生愈来愈多，对留学生进行汉语語法教学具有特別重大的意义。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語文专修班編写的《汉语教科书》(上、下两册)是根据几年来的教学經驗認真总结而編成的。由于它切合汉语实际，又尽量針对外国人学习汉语中的特殊困难，出版以来受到国内外讀者的欢迎。

解放以来，各类业余学校，尤其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出现的红专大学普遍设有“语法修辞”课程，广大人民响应党关于向文化进军的号召，迫切需要学习语法（以及文学、历史、逻辑等）知识，这就为语法教学开辟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语法学与社会联系的面更宽广，它的社会基础更加坚实了。

二

十年来，不仅语法知识普及和语法教学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而且在语法学本身也起了重要的变化，获得很大的进展。

解放后，语法学家学习了马列主义，这对语法的研究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斯大林同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的发表给我国的语法学家指出了正确的道路，汉语语法的研究因之起了转折性的变化。苏联先进的语言学、语法学家也给我们很大的帮助。1955年鄂山蔭同志、郭路特同志来我国参加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时，介绍了苏联汉学家研究汉语语法的情况；1958年冬谢列勃连尼柯夫同志来我国讲学，作了《论语法结构的研究方法》的报告，穆德洛夫同志也在刊物上参加了我们的词类问题讨论，这些在中国文化合作事业中都起了良好的作用。特别是苏联汉学家的许多著作先后被介绍到我国来，对我们的帮助很大。苏联汉学家完全不同于西方汉学家那种厚古薄今的作法，他们既重视古代语言材料的研究，更重视现代语言材料的研究。在语法研究方面，很重视研究现代汉语的形态问题，对现代汉语的形态学和造句法的研究作出了不少成绩。龙果夫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康拉德的论文《论汉语》都对我们的语法学起了很大的影响。我们的语法学家从这些著作中受到不少启发。苏联汉学家也很重视我国学者的研究和意见，他们积极介绍我国学者的语法著作，吸收我国语法学家的研

研究成果。比如苏联出版的《华语教科书》的语法体系就采纳了我国学者的不少意见。中苏学者互相合作，有力地推进了汉语语法的研究。在学习苏联的方针下，我们的语法研究也开始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进行。

解放前，我国语法学是在西方资产阶级语言学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它存在着许多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学术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解放后，党帮助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很多语法学家也在党的帮助下，开始批判自己。王力在《中国语法理论》再版的《新序》中检讨了搬用叶斯柏森“三品说”的缺点。吕叔湘在《中国文法要略》的修订本序中也对此作了检查，并删去了有关的章节。陆志韦对自己在《北京话单音词词汇》中所用的同形替代法作了自我批判，黎锦熙也修正了《新著国语文法》中的一些不正确说法。特别是1958年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运动中，对语法学中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更展开了比较集中的批判。语法学家黎锦熙、王力、吕叔湘、陆志韦、高名凯等都受到了批判。批判的主要内容是：为研究而研究、理论脱离实际的学术思想；主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忽视汉语特点、崇拜西方语法理论，生硬搬用西洋语法体系的作法等。还有，对资产阶级粗制滥造的治学态度也进行了批判。通过学术思想批判，不但对解放前语法学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作了初步的清算，而且指出了目前语法研究中的问题，解除了妨碍语法学发展的束缚。

解放前，语法是少数专家学者的事情，一般地说，他们是各搞一套，互不过问，语法学是在个人钻研的情况下缓慢地发展着。解放后，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学术讨论在一切科学领域内蓬勃展开，语法学也不例外。语法中个别问题的争辩，语言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对某一语法问题举行讨论会已是经常的事情。就是在杂志上展开的语法问题的大型讨论就有关于

詞類問題的討論、主賓語問題的討論、什麼是詞兒的討論、單復句問題的討論等。1956年還在青島召開了語法座談會，許多語法學家聚集一堂，交流了研究情況，交換了對語法問題的意見。

詞類的區分是一個很老的問題，解放前就有過許多不同的意見。1952年在《中國語文》《語文學習》上發表了幾篇關於劃分詞類的文章。1953年10月在《中國語文》上發表了高名凱關於漢語實詞不能分類的文章後，掀起了廣泛的熱烈的討論，直到1955年5月才基本上告一段落。這次討論雖沒有解決漢語的詞類問題，但是它使大家明確了不能單純憑意義來劃分詞類，使大家對漢語有無形態以及漢語形態表現在什麼地方進行了有益的探討，推動了大家對詞法的重視和研究。

主語賓語問題的討論是1955年7月在《語文學習》上展開的，1956年4月基本上結束。這次討論從語法跟邏輯的關係、語法跟修辭的關係討論到倒裝句、省略句等問題，從主語賓語的定義討論到時間詞和空間詞作主語、句子形式做謂語、賓語和補語的分合等問題。儘管各人的意見還有許多分歧，但是通過討論，大家認識到分析句子、確定主語和賓語必須同時顧到結構和意義，認識到漢語的句型、句式是豐富的，推動了大家對句法的重視並深入進行研究。

除了學術討論外，還有集體進行研究。《語法講話》就是語言研究所語法小組寫的；《漢語構詞法》也是語言研究所一部分同志集體寫的。中學《漢語》課本、《語法和語法教學》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組織國內許多語法學家共同編寫的，其他高等學校也多採取集體編寫語法教材的方式。這表明解放後語法學在加強合作、發揮集體力量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步。

《語法講話》和《漢語》課本不僅在語法知識普及和語法教學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語法學的發展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語法講

話》是解放后提出的第一个語法新体系，材料相当丰富，分析很细致。虽然有些問題尚待商榷，有形式主义的毛病；但是它提出了不少可取的論点，引起了語法学界对語法形式、語法結構的重視。《汉语》課本吸收了各家的长处，綜合了几十年来汉语語法研究的成績。这一系統虽然也还存在着缺点和沒有解決的問題，但是在目前來說，它确实是一个比較好的系統。发表以来，許多人贊同它，提出了許多例証来充实它，或者修正它的个别論点，使它日趨完善。即使不贊同它的，也只能在个別的問題上提出意見。

正确的理論指导，正确的研究方法，学术討論，集体研究，这就构成了語法研究中嶄新的局面，推动了語法学的飞速发展。綜合起来看，十年来汉语語法研究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首先，解放后开始并重詞法和句法，詞法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解放前，語法学家受了西方資產階級学者把汉语看作单音节語、孤立語的影响，因此从黎錦熙先生提出“句本位文法”起，所有的語法学家多只注意句法的研究。王力先生说：“汉语沒有屈折作用，于是形态的部分也可取消。由此看来，中国語法所論，就只有造句的部分了。”^①这可以說是解放前語法学家的共同認識。因此，在他們的語法著作中，就沒有詞法的地位，完全把語法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詞法抹煞掉了。《馬氏文通》虽然是以詞类为綱来講語法，但实际上也多是講的句法問題。

事实上，任何語言的語法都應該有詞法和句法两部分。汉语虽然沒有印欧語那样的詞形变化，但是它有自己的形态，有自己的詞法規則，这是可以肯定的。抹煞了詞法不仅是錯誤的，而且就是句法的部分也无法真正研究好。解放后，糾正了忽視詞法研究的

① 王力：《中國語法理論》上冊，8頁。

錯誤，展开了关于形态学的討論，肯定了漢語是有形态的，詞法的研究受到了普遍的重視。

我們知道，構詞法是語法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在漢語語法中尤其占有特殊的地位。因为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在漢語語法研究中，詞的界綫还不清楚。进行構詞法的研究，就能帮助解决詞的界限問題；而且掌握了詞的構成規則，对詞性辨别和詞的用法也有帮助；同时对解决漢語拼音文字的連写規則也有好处。因此，構詞法研究的进展，是漢語語法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成績。

詞法的被重視，首先表現在構詞法的研究上。解放前語法学家对構詞法都不很重視，1940年后才有少数的語法著作在講句法之前，簡略地提到一些構詞方式。解放后，情形就不同了，許多語法研究工作者都从事了这方面的研究，写出了不少論著。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陆志韦等的《漢語構詞法》是这方面最重要的著作。它材料丰富，分析也比較細致，全面地探討了現代漢語中的構詞格式。虽然沒有最后解决漢語構詞法的問題，但可以說是总结了現有構詞法研究的所有成果。其次《漢語》課本、張志公的《漢語語法常識》、胡附和文煉的《現代漢語語法探索》也对構詞法作了比較詳細的分析。黎錦熙解放前根本不講構詞法，但是在解放后的《中国語法教材》的《附編》里，却相当詳細地講述了漢語構詞法。高名凱的《漢語語法論》原来只有“句法論”“范疇論”“句型論”三部分，構詞法是放在緒論中附帶講的，在1957年的修訂本中他也把構詞法抽出来独成一篇。总之，从1951年以后，所有新出版或修訂重版的語法书都增加或充实了構詞法的内容。

詞法的被重視还表現在研究詞类划分和研究詞类的語法特点方面。解放前，語法学家只根据意义来对詞进行分类，根本不研究詞的語法特点。有的甚至認為詞的分类“只是語法的皮毛”，只是为了講語法的方便。这显然是錯誤的。解放后，大規模地进行詞

类問題的討論，提出了一些分別詞类的方法，探討了一些詞类的語法特点，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它促进了語法学的发展。通过这些討論，語法学家都有意識地重視詞法的研究。有的研究某类詞的語法特点，有的研究某两类詞的區別，朱德熙的《形容詞研究》就比较詳細地研究了形容詞的語法特点。中学《漢語》課本用了很多篇幅談詞法，在講述每类詞的时候，都介紹它的語法特点，可以說是綜合了現有漢語詞法研究的全部成果。

苏联汉学家龙果夫說：“各种語言的語法結構的本質反映在詞类上。离开詞类，既不可能理解漢語的句法特点，也不可能理解漢語形态的特点，因此就不可能說明漢語語法。”^① 这一意見是正确的。足見詞类的分辨，詞类語法特点的探索，在語法研究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在这方面取得的任何进展，无疑都是漢語語法研究的重要成績。

其次，十年来漢語語法研究的进步还在于明确了在研究方法上要把意义和語法形式結合起来，并且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績。

解放前，从《馬氏文通》起，語法学家基本上都是从意义、思維、概念出发来研究語法的。黎錦熙說：“思維底規律，并不因民族而区分，句子底‘邏輯的’分析，也不因語言而別异。”^② 因此，他的“句本位文法”是“从句子底‘文学的’次序上，透进一层，看出‘邏輯的’次序来”。^③ 这就是說，“句本位文法”分析的是句子邏輯关系，而不是語法結構、語法規律，那末实际上就是一种“邏輯本位”的語法，把邏輯和語法完全混同起来了。这当然是錯誤的。王力、呂叔湘、高名凱等也多从意义、心理、思維、概念来研究語法。这就不能不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抹煞或者曲解了某些漢語語法規律。

同时，單純从意义出发研究語法，又会对某些語言現象作毫无

① 龙果夫：《現代漢語語法研究》（中文版）著者序。

②③ 黎錦熙：《新著國語文法》引論。

意义的煩瑣分析。比如黎錦熙在《新著國語文法》中把名詞分成了三类十二种，加上量詞(名詞的附类)的三种，总共十五种。斯大林同志說：“語法把詞和語加以抽象化，而不管它的具体內容。”^①黎錦熙这样的分析，显然是在考慮詞的具体內容，不是語法規律的研究。解放前的語法著作大多有同样的毛病。

解放后，大家認識了單純从意义出发研究語法是錯誤的，都开始重視語法形式。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語法小組的《語法講話》、陆志韦等的《漢語的构詞》就都是偏重形式結構的；胡附、文煉在《現代漢語語法探索》中也相当強調从語法結構和意义相結合的原則来研究語法；詞类問題的討論、主賓語問題的討論更是大多數人都強調語法形式和意义相結合的原則，也試圖用这原則来解决問題；《暫拟漢語教學語法系統》和中学《漢語》課本在貫徹語法形式和意义相結合的原則方面，更作了很多努力。就是解放前強調从意义、心理、思維来研究語法的人也改变了观点。比如解放前王力認為：“中国的詞不帶詞类的標記，所以不顧形式才是詞类区分的正当办法。”^②但是1955年在《关于漢語有无詞类的問題》中，也主張“應該注意詞的基本意义跟形态、句法統一起来”，“應該尽先应用形态标准”，“在不能用形态标准的地方，句法作用是起决定作用的”。^③呂叔湘在《关于漢語詞类的一些原則性問題》中也提出：“詞类是根据語法特点来分的。”“結構关系、‘鉴定字’，能否重迭以及用什么方式重迭——这些都可以用来划分詞类。”“結構关系能照顧的面最大，宜于用来做主要的分類标准。”^④也不再主張从意义划分詞类。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21頁。

② 王力：《中國語法理論》上册，24頁。

③ 《漢語詞类問題》第二集，61頁。

④ 《漢語詞类問題》第一集，171—172頁。

当然，語法形式和意义怎样結合还是个沒有彻底解决的問題；不过大家都明确了方向，开始朝这方面努力，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是語法研究中的重要收获。

还有，語音形式和語法形式的关系也开始被重視，許多单篇文章和語法书都注意到这点，还有專門討論这問題的文章。同时十年来汉語語法研究根据的材料多是現代典范的白話文著作。这跟过去有些語法著作把文言和白話混在一起研究或是以清代小說为主要材料的情况很不同。語法是发展的，清代的小說离現在數百年，它不能代表現代汉語。特别是把时代不同的材料混在一起，古今杂收，新旧并蓄，有許多規律就无法建立。分清断代和历代，分清历史的研究和描写的研究，这也是十年来語法研究中的进步。

上面主要是談的現代汉語語法研究方面的收获，在历史語法的研究上解放后也有不少进展。解放前历史語法研究是很少的，只有一些单篇論文探討了历史語法中的个别問題，还有些語法书对古今語法作了一些零星的比較。解放后历史語法的研究日渐多了起来，历史語法中有許多問題都开始有人探索。洪誠的《論南北朝以前汉語中的系詞》、黃景欣的《論否定詞勿与不》、周迟明的《汉語的連动性复式動詞》，都对历史語法中的个别問題作了比較詳細的研究。刘景农的《汉語文言語法》、張貽惠的《古汉語語法》也都比解放前的“文言語法”有了一些进步。王力的《汉語史稿》中册在历史語法的研究方面有重要的地位。它接受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也提出了一些新見，如被动式的发展等。它是第一本比較全面地闡述汉語語法发展史的著作。尽管它談的問題还比較零碎，离全面地闡述汉語語法的客观发展規律还差得很远，但是我們总还是有了一部历史語法。这不能不說是十年来語法研究中的重要进展。

还有方言語法的調查研究也逐漸开展起来。近几年来，《中国語文》上时常登載一些研究方言語法的文章，新出版的方言学著作

大多談到方言語法。內容雖然還不够深入，但是解放前這完全是一個空白點，現在总算把它填補起來了。隨着方言調查研究的進一步開展，方言語法的全面深入的研究，也一定指日可待。

歷史語法研究和方言語法研究的進展為歷史比較語法學的建立作了準備，也為進一步深入地研究和了解現代漢語語法創造了條件。

現在，漢語語法研究中主要的問題仍然是要加強學習馬列主義的語言學和語法學，進一步肅清資產階級的學術思想，擺脫西方唯心主義語言學和語法學的影響，使馬列主義語法學理論進一步貫徹到漢語語法研究的各个方面去。其次，我們需要全面地掌握材料，進行更深入的研究。我們的研究工作一般還不是建立在極其豐富的材料基礎上的，許多的語法現象還有待我們去發掘。我們只有在充分地占有材料的基礎上，才能更好地解決漢語語法研究中現存的問題，把漢語語法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平。此外，如何結合漢語來進行語法理論的研究，如何解決意義和形式相結合的問題，如何把歷史語法研究和方言語法研究更加推進一步，並把它同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結合起來，都是有待我們去努力解決的問題。

解放十年來，漢語語法的研究無論在哪方面都有很大的進步。我們可以說，漢語語法的全面研究（包括現代語法、歷史語法、方言語法）已經開始並且正在健康地發展着。

十年來漢語語法學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並非偶然。

解放前，廣大人民羣眾對語法學是陌生的，語法的學習與研究停留在一個比較狹小的範圍里。解放後，文化教育的普及，廣大人民羣眾要求掌握科學文化知識，以便更好地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這樣，就為語法學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廣闊的社會基礎。

黨的領導是語法學得到巨大發展的保證。黨非常重視語文知

識的普及，重視語文教學，重視漢語規範化的工作。1955年10月在黨的領導下召開了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討論了漢語規範化的重要意義、規範化的方法和步驟以及現代漢語規範化的具體要求。1956年6月2日發表了“國務院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在黨的領導下，普通教育和業餘教育中都加強與改進了語文教學，國家機關和部隊都曾普遍開展語法學習，語法知識得到了很大的普及。

黨號召我們向蘇聯的先進的語言學學習，在回顧十年來所取得的成就的時候，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蘇聯先進的語法學所給予我們的巨大幫助。

十年來漢語語法學的成就是與在黨領導下的語文教師、語法工作者的努力分不開的。老一輩的語法學家經過黨的幫助與教育，提高了政治覺悟，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在業務方面也有很大的提高，參加了語法知識的普及、語法教學等各種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貢獻。青年語法工作者成長非常迅速，新老語法工作者團結合作，形成了一支很大的科學工作隊伍。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清洗了一批語言學界的右派分子，加強與鞏固了黨的領導。

十年來的成就是巨大的，瞻望未來，我們應該在黨的領導下，在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更加百倍地努力，使漢語語法學更好地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解放前汉语语法的研究

——《近六十年中国语言学》(初稿)的一章^①

一、概述

某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认定汉语是落后的语言，是没有语法的语言，又认为中国人也没有语法的观念，其实这完全是无耻的诬蔑。

汉语有极悠久的历史，从有史可查的甲骨文算起，也有了三千多年(汉朝以前可以叫做华语)。可以完全肯定现代汉语的要素早在甲骨文以前就已奠下基础，甲骨文的语法构造已经发展到相当高度，现代汉语语法构造的雏型早在那时就已经孕育成熟。因此，说汉语没有语法规律的谬论是用不着多驳的。

至于说中国人没有语法观念的翻言，也完全是毁谤。根据可信的史料，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我们就有了关于汉语语法的分析研究。如《春秋》僖公元年，“邢迁于陈仪”一条，《公羊传》解释：“迁者何？其意也。迁之者何？非其意也。”这就是语法上自动和他动的辨别。《谷梁传》还有关于语序的分析。汉代的注疏家和文字学家又创立了一些名目来解释虚词。如《说文解字》：“者，别事词也。”“只，语已词也。”唐代柳宗元在《复杜温书》中，更把语气词分成“疑词”和“决词”，成了《马氏文通》把“助字”分为“传信”

^① 《近六十年中国语言学》是我系去年开始的集体科研之一。提纲经编写组讨论，全稿经多次征求意见，正在修改中。现在抽出其中一章，发表出来，以便更广泛地征求意见。这一章最初是由郭锡良、祝敏彻执笔的，后来又经郭锡良改写过。